

《四库全书》的种数问题

易雪梅 吴明亮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乃至十八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初缮七份,分度七阁。其命运多舛,未及百年,已毁其半。书成后有四阁相继惨遭兵火,至今完整保存者仅三阁而已,经此事变,四库研究遂大受影响。今人之于《四库全书》,以国宝待之,有诸多学者进行研究,并形成“四库学”。然在“四库学”研究之诸问题中,尚有许多未有定论。种数问题,其一也。其始,《四库全书》编纂者并未明言是书收书若干种。较早论及《四库全书》种数者为清同治年间平步青著《霞外摭屑》云3460种;1935年出版任松如著《四库全书答问》云3457种;1937年出版郭伯恭著《四库全书纂修考》则云3470种。此后,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2年王清原先生著文于《文献》杂志云:多数学者认为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在现存三部半中是收书最多的一部,但到底多收多少种,没有统一的说法。笔者遂将文溯、文渊、文津三阁全书目录逐条目核对,发现现存三阁全书并无收书多寡之差异,统计数据之差异实由统计者所依据之书目在著录时对《四库全书》所收书籍中的附录及合刊书,在著录或统计时的处理方式不同所致。而目录差异之根源在于量词“种”的概念模糊。进而得出结论,因书目著录的“尺度”不一,《四库全书》之种数问题无法得到精确答案。本文即述笔者对此之浅见。

一、所谓的“种数问题”

所谓的“种数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四库全书》的收书种数。《四库全书》收书多少种,本是定数,不存在什么“种数问题”。但是《四库全书》誊录七份,分藏各处,加之卷帙浩繁,不便于比较研究,所以,对于《四库全书》到底收了多少种书,现存三部半的收书种数是否相同,是否存在某种书此有彼无的情况,学界难以形成权威性定论。

2002年第3期《文献》杂志王清原先生《文溯阁与〈四库全书〉》云:“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乃属现存《四库全书》中收书最多的一部。”“较台湾故宫所藏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所收3460种(据影印本统计)多14种;较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所收3470种多4种;较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所收3450种多24种。”文章发表以后,至今没有见到争鸣文章,学界似乎默认了此种说法。但这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其结论值得商榷。

另外,对同一阁《四库全书》共收了多少种书的问题,也没有确切的说法。以文溯阁全书为例,1935年金毓黻辑录《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3474种;1938年(满洲国)国立奉天图书馆编《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3590种;1946年国立沈阳图书馆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概况》(稿本):3590种;周之风所撰《沈阳博图两馆接收记》:3590种;1966年辽宁省图书馆向甘肃省图书馆移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清点记录:3474种;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3590种。而2001年6月《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清点册》最新的统计结果是3477种。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种数问题”,尚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二、对问题的研究

如前所述,《四库全书》分藏各处,卷帙浩繁,进行比较研究十

分不便。所以,对其种数问题,不可能将原书一一对照,只能选择比较权威的目录进行比较,目录的可信度即为研究此问题之关键。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采信以下目录: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时,根据现存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编辑,是现存文渊阁《四库全书》最可信最权威之目录。

《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清点册(2001年6月)》,文溯阁《四库全书》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2001年书库管理人员交接的时候曾做过一次清点,这次清点的清单也就是现存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最新的目录。因此书乃国家一级文物,管理人员责任重大,清点的时候逐册点数,所以,该目录的可信度也是较高的。

《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该书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毓黻先生主持满洲奉天图书馆时,组织人力,将馆藏文溯阁《四库全书》之提要逐篇辑出,汇编而成。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六日热河总管世纲、英麟奏折中所附的《文津阁收存书籍数目清单》,光绪二十五年(1899),光绪帝曾令时任热河正副总管的世纲和英麟清查文津阁藏书。世纲和英麟在当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汇报奏折中列出了文津阁藏书的数目清单,该清单逐一系列出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度藏书籍的书名、卷数和作者。可视为文津阁《四库全书》之简明目录。

笔者依据上述目录相互比较,进行了两次核对(核对过程中均制作表单存留备查)。核对后,笔者发现除了《日讲诗经解义》一书在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的目录中皆有而在文渊阁本的目录中独无之外,三部书的书目完全一致。而《日讲诗经解义》在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的目录中分别注明是“有函无书”和“空函”。既然是空函,台湾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全书的时候,自然无法收入,目录中没有列书名是必然的。因此,仅就书名(不考虑卷数、册数和叶数)而言,三部书收书种数是完全一致的,并无此有彼无的情况。

此外,尚有另一个事实可以佐证笔者之结论,近年来国家图书馆专门组织人力对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集部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不同阁的同一种书,其卷数、篇数未必相同,即是卷数、篇数相同,文字也会存在差异。199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文溯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共收录历代诗文四千余篇,全部辑录自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集部书,为同书之文溯阁本所未见”。以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比较研究,仅集部两者差异达50%以上。尽管如此亦没有提到某一种书在文溯阁本或文津阁本中是完全没有的。根据国家图书馆专家提供的资料,和笔者在对文溯阁、文溯阁两阁中几部同种图书的比对中发现,因四库诸阁系单独抄录而成,各阁收录的内容、所据版本似乎不尽相同。

三、书是怎样“多”出来的

(一)造成统计数据差异的原因

既然收书多寡完全一致,那么,王清原先生文中所言的“4种”、“14种”和“24种”是怎样“多”出来的呢?文溯阁《四库全书》为什么有不同的统计数据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即现存三阁全书就书的品种而言,是完全一致的。就各书统计数据的差异及文溯阁一部书的种数就有三种不同的统计数据来看,之所以造成统计数据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统计的依据有差异。

经过笔者核实,就个体书目著录而言,《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统计的3474种,无误;《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清点册(2001年6月)》统计的3477种,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言文津阁3503种、文溯阁3590种、文澜阁3450种以及陈垣先生说文津阁3462种,皆未与原书核实。不过,陈垣乃著名学者,耗时十年在京师图书馆研究文津阁全书,并成《四库书名录》、《书目考异》等著作,所持3462种之说当无清点有误之虞。

不同的统计数据由不同的依据所出。如前所述,文溯阁3474中

之说依据《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文溯阁3477种之说依据《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清点册(2001年6月)》;文渊阁3460种之说依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可以肯定:统计数据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统计时依据了不同的目录。那么,这些目录的差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二)对统计依据——各目录差异的考查

考查前述四种目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清点册(2001年6月)》、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六日热河总管世纲、英麟奏折中所附的《文津阁收存书籍数目清单》,发现诸目录的全部差别集中体现在对两种书籍的处理上:一种是若干种书合刊后取一个统一书名的书籍。如经部易类《楚蒙山房易经经解》为《学易初津》、《易翼宗》和《易翼说》合刊而成,还有同属经部易类《乾坤凿度》、《乾凿度》、《稽览图》、《坤灵图》等八种书合刊为一种的《易纬八种》,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另一种是有附录的书籍,如经部易类《禹贡论》,附录《禹贡山川地理图》;经部春秋类《春秋经解》,附录《春秋例要》;史部杂史类《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附录《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议覆》和《世宗宪皇帝谕行旗务奏议》等,不一而足。

上述各目录在对这些书籍著录时,是分列还是合列,处理方式并不一样。如前述经部易类《学易初津》、《易翼宗》和《易翼说》一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作3种,《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作一种,《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清点册(2001年6月)》作一种,《文津阁收存书籍数目清单(1899年)》作三种。下页表中列出了上述四种目录之间存在差异的部分书目:

由表中可以看出,依据对前述两种特殊情况处理方式不同的目录所统计出来的种数自然是不同的,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四种目录所列种数

序号	部类	书目	文渊阁 目录	金毓黻 本提要	甘肃省 目录	文津阁 目录
1	经部易类	(楚蒙山房易经经解之一、之二、之三) 学易初津、易翼宗、易翼说	3	1	1	3
2	经部易类	(《易纬》八种)乾坤凿度、乾凿度、稽览图、坤灵图、乾元序制记、是类谋、通卦验、辨终备	8	8	1	1
3	经部易类	禹贡论、禹贡山川地理图	1	1	2	1
4	经部诗类	毛诗写官记、诗割	2	2	1	2
5	经部春秋类	春秋经解、春秋例要	1	1	2	1
6	经部四书类	孟子集注考证、论语集注考证	1	1	2	1
7	史部杂史类	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议覆、世宗宪皇帝上谕八旗行 帝谕行 旗务奏		议	1	1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不同数据在统计时依据了不同目录,而这些目录对《四库全书》中书籍附录和合刊书的处理方式并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就是造成统计数字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不同的目录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呢?笔者认为,根源在于对量词“种”的概念理解不同。“种”的概念没有严格的界定,它只是一个模糊的量词。也就是说,两种书之所以是两种“种”,是不同个体在主观上依据书的作者、内容等因素区分的。在两种书迥乎不同时,很容易区分。如《大唐西域记》和《尔雅》是两种书,肯定毫无异议。但当两种书的联系很紧密,或者由于历史原因,一种书附在另一种书之后出现的时候,说它们是一种书还是两种书,就会有不同见解。如《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诗林广记前集》、《诗林广记后集》;《古城集》、《古城集补遗》等。对于这种情况,当该书为学界所熟识时,并不会出现混乱。如一般认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就是两种书。但并非所有古籍均为《资治通

鉴》那样广为人知,如前文提到的《古城集》等。对这类书,在统计的时候,按一种计还是按两种计,会有不同见解。这是造成不同目录有不同处理方式的根源。

因此,只有在统一的、严格的著录标准之下,对现存三阁做重新著录之后,才能给《四库全书》的收书“种”数确定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要问《四库全书》共收书多少种,目前的回答只能是“约……种”。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后记》云:“《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余种。”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一种负责的说法。

参考文献:

- 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 ②北京图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 ③杨家骆:《四库全书概述》(中国图书大辞典提要组第一种附录),(中华民国)南京东瓜市九号辞典馆,民国26年再版。
- ④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1992年据北平研究院史学会1937年版影印。
- ⑤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上海书店,1992年据启智书局1935年版影印。
-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 ⑦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 ⑧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⑨王清原:《文溯阁与〈四库全书〉》,载《文献》2002年第3期。
- ⑩李祚堂、韩国建:《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问题》,载《天府新论》1999年第1期,页75-83。
- ⑪金毓黻:《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国文献缩微中心,1999年版。
- ⑫胡宜柔:《四库全书共收多少》,载《新华文摘》,1981年第2期。

作者工作单位: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